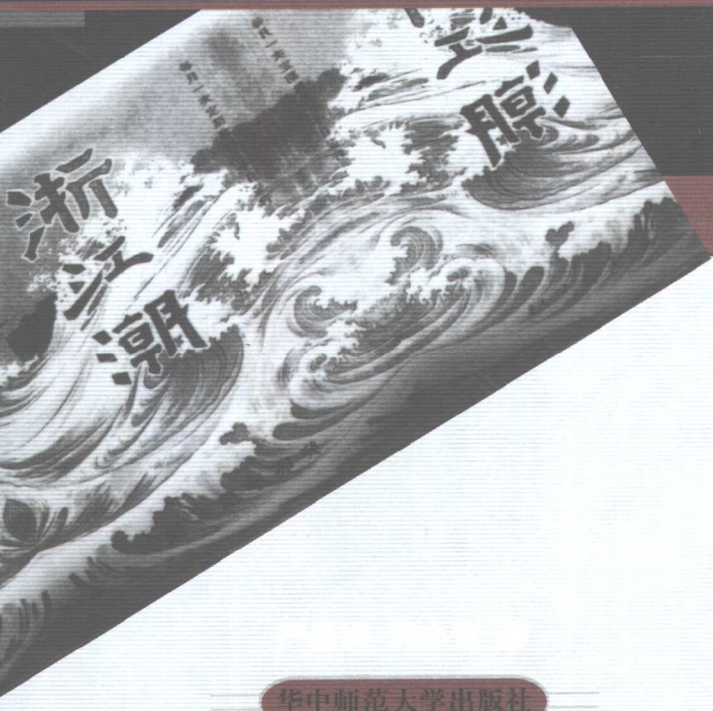




癸卯年万岁

G M N W S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癸卯年万岁

——1993年农历癸卯年春联、横批、条幅、斗方、扇面——



湖北省社会科学 1999 年度重点项目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癸卯年万岁

——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严昌洪 许小青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癸卯年万岁: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严昌洪,许小青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5622-2479-X/K·144

I. 癸… II. ① 严… ② 许… III. 中国—近代史—1903 IV. K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543 号

癸卯年万岁

——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 严昌洪 许小青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刘道静 王晓华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新视点

督 印:姜勇华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1500

印张:9 字数:234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精装):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论 1903 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代序）

章开沅

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上，癸卯（1903 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江浙又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地区。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在这里发展最快，资产阶级势力在这里比较活跃，而且因为这里出现了一支生气勃勃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空前的滋长和蔓延。

（一）

如果说，东京留学生界是海外的革命策源地，那么江浙便是国内的革命策源地，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策源地。这一点，当年江浙地区进步知识界是已经意识到了的。

“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翹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①

这是从广义的江南地区来看进步知识界思想演变的迅速。

^① 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新世界学报》，第 14 号，1903 年 3 月 15 日。

爱国学社在上海的建立，全国为之瞩目，甚至连海外的学生、商人都极为关注。“仿佛这个学堂可以造就出来许多拿破仑、华盛顿、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的一般人才来。他们顽固的官场又道这个学堂希奇得很，他们办下去，必定要造就出来许多造反的家伙，仿佛有许多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文、康有为一般人才。”因此，江浙的进步知识分子反躬自问：“这样看起来，我们爱国学社之办好办不好，办得下办不得下去，不是关系中国的大局么？不是差不多中国的兴亡都赌在这一个学堂里么？”^①

接踵而起的浙江大学堂（原求是书院）退学风潮，也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诸君！吾所谓建设新中国小舞台，出现于浙江省会者，何事乎？即近日大学堂退学诸君所建设之新民塾是已。观其脱专制之轭，秩序井然，无一暴动，真可谓文明自由者。彼又固结团体而以自力建设其理想中完全粹美之学校，是真所谓具新中国国民之资格者。呜呼，诸君而日日欲脱专制昌民权者，盍于此小试其手段也？”^②这是江浙进步知识界对大学堂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建立的新民塾的评价与期望。

学潮，或者用《苏报》的说法——学界风潮，是20世纪初在旧中国的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而江浙则是1903年前后学潮最为鼓荡发达的地区。自从壬寅年（1902年）夏杭州养正书塾（后改名杭州中学堂）风潮，10月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退学大风潮以后，癸卯年（1903年）3月又连续发生了南京陆师学堂散学风潮和浙江大学堂退学风潮，其他杭州蕙兰书院、上海广方言学堂、苏州毓元学堂等校也相继发生风潮。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① 《教育会会员蒋君性才由日本寄来演说稿》，载《苏报》，1903年5月21日。

^② 《敬告浙江志士》，载《苏报》，1903年4月19日。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四亿人民都蒙受了空前的屈辱，然而 20 世纪的到来毕竟又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希望。青年学生是社会中最敏感、最活跃的一种力量，因而进步人士便把希望寄托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潮。他们充满信心地说：“然吾观学界风潮溯江而上，昔年骤发于上海，今已派人金陵矣。自金陵而安庆而武昌而重庆，必有相继者，可预信也。长江上下游，风潮怒翻，而黄河南北必有起而应者，可预信也。自北而南，而西江上下游各行省，如广东奴隶极点之学堂，亦必有起而应者，可预信也。以长江为中枢，北而黄河，南而西江，风潮遍及，由水而陆，则可普及全国，吾惟日夜祷祝。”^①“我中国学界之风潮，其膨胀于二十世纪中者，今日其起点乎？”^②

把全国革命运动的普及，仅仅寄托于学界风潮的发展，这未免过于夸大了青年学生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农民乃是国民革命的基础。但在 1903 年，江浙地区的先进知识界毕竟具有慧眼，他们已经看出，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是反动而又腐朽的封建帝国的对立物，是属于未来的新中国的国民。“民约服卢梭，强权伟斯宾，潜心观天演，愿从达尔文。”^③ 这些用进化论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初步武装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同于历史上那些爱国而又忠君的封建士大夫，甚至也不同于戊戌变法时期那些彬彬儒雅叩头上书的举人老爷。他们虽然多半出身于封建文化营垒，然而已经决心与古老的旧中国诀别，并且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埋葬统治已达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从世界观与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来看，他们比较明显地

① 蒋竹庄：《论南京陆师学堂退学事》，载《苏报》，1903 年 4 月 13 日。

② 《童子世界》，载《江苏》，第 1 期（1903 年 4 月）。

③ 松岑：《今怀》，载《江苏》，第 4 期（1903 年 8 月）。

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范畴。他们的青春似火，热血如潮，心甘情愿地为祖国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而献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只有他们是自觉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

1903年是伴随着革命排满的呼声而来到江浙地区的。过去，我们往往过于强调“拒法”与“拒俄”运动的惊醒作用，过于强调进步知识界从爱国到革命转变的急剧，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拒法”、“拒俄”诚然起了强烈的刺激作用，癸卯5月以前的运动诚然多半以爱国救亡的形式出现，然而江浙进步知识界的民主革命觉醒却早有积蓄，他们是比较自觉地跨越了“拒法”、“拒俄”运动而进入公然倡言革命排满新阶段的。

姑且不谈《新世界学报》和《大陆》在1902年的启蒙宣传，也姑且不谈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中革命思想的酝酿，就拿《苏报》来说，它的公开标榜革命排满，也在“拒法”、“拒俄”运动全面展开以前。1903年3月3日的《苏报》发表《军解》一文，已经提出“军国民教育”这个名词。并且强调：“凡陶铸一大民族，占世界优美特色之文明点者，未有其全国军人不流国民之血、堕国民之泪而能产出者。”3月12日，《苏报》发表《书近日新闻后》，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宣传了东京留学生元旦团拜的革命排满演说。3月14日又发表《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一文，公开宣称：“迨戊戌政变，刚、荣之徒，窃握大柄，神皋旧壤，生机遏绝，于是汉族知身家性命终不足托顽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在我者，乃倡为自立革命排满之议。”并且勉励自命为中国主人翁的“汉学生”，不要以革命排满为口头禅，应该多务革命排满的实际。及至3月26日发表的《论东京留学满汉之冲突》一文，言论更为激烈，毫不掩饰自己的民主革命倾向。作者充满信心地说：“幸今者欧化东渐，民权自由之说，人群进化之理，日充积于青年之脑筋，有史（以）来遗传之性质为外界魔力所摄去者，一旦得复其本来，则其勃发不可复制，如火之燎

原，水之溃堤，岂一手一足所能阻遏哉！浅识之士主调和之政策，而不知其无（可）调和也；顽固之徒谋压制之方法，而不知其无可压制也。孰优孰劣，孰胜孰败，一任天演之自然而已。”

（二）

1903 年 4 月以后，“拒法”、“拒俄”运动紧相衔接，在全国范围出现反帝斗争的新高涨。东北和南方边疆同时产生的严重危机，增添了进步知识界的紧迫感；而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又为民主革命思想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温床。爱国与革命，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新的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

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要在被侵略国家引起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运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这样一部民族运动史。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运动有其特定的主要承担者。在 1900 年以前，中国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农民以及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虽然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但他们都显然未能起支配作用。到 20 世纪初年，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并且逐步掌握了引导运动向前发展的主动权。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其中若干有识之士甚至相当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民族运动与往昔的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90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涨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显得空前活跃。但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把民族主义作为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说：“欲达此莫大之目的（指‘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引者），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地（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① 当年的爱国志士，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于严格意义的近代民族运动，确曾从理论上和历史上作过认真的研讨。譬如癸卯春间在《浙江潮》上连续刊载的《民族主义论》，就是这样一篇代表作。作者说：“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维也纳会议成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及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澳意战，而德澳战，而澳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英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之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

作者的论述显然不尽确切而且也很不全面（特别是对亚洲的论述比较疏略），但这表明作者对于自己正在从事严格意义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这一点，则是相当清醒和自觉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吾言民族主义，何以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曰：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者也。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然兹所谓统一云者，志意的统一，非腕力的统一也；共同的统一，非服从的统一也。……若专制政体，则何有矣？”^② 他们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看待民族问题的，因而便把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君主专制政体联结在一起。

① 竞鑫：《政体进化论》，载《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② 《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江浙地区的有识之士特地把义和团运动列为民族主义的“萌芽”或“胚胎时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中蕴藏着强大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说是：“夫山东、直隶之民，虽文事不如吾乡，其程度或在中下之交，然打拳习棒，争欲灭洋，卒能创为义和团顽固之举，使各国不得不同心协力，劳民伤财，联兵以入此老大帝国之境。此其举动虽曰野蛮，然一时快心辣手，逞血气之勇，乃至使外人蹙额屏足，莫可谁何，此亦可以于困顿无聊之际，暂自慰矣。”^①但是，他们对义和团落后的一面是有所批评的，并且特别憎恶清朝顽固派对义和团落后因素的利用与煽动。1903年5月8日的《苏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箴国民》的论文，就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这种笼统的排外主义的认识低下和没有前途。作者说：“不观夫载漪、刚毅之徒乎，以忠义激励其士民，振臂一呼，扶清灭洋之裹红巾者踵踵骈肩于都下。彼辈方掀髯色喜，以为尊君亲上之效果显而有征；即有识之士论东亚民族胚胎之迹者，亦且屈指及之。”但是，“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一点而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事，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妬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地主与农民本来是互相对抗的两种社会力量，“两盲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自然是模糊了两者之间的阶级区别。但是处于低级认识阶段的笼统排外主义与尊君亲上之类封建伦理思想的麻醉，却有可能使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与一部分农民反帝斗争队伍结合起来，并且被清朝

^① 《民族精神论》，载《江苏》，第8期（1904年1月）。

统治者诱引到错误的道路上，以致演成一出历史大悲剧。应该承认，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以往的反帝斗争是有所继承又有所扬弃的，他们把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文明排外”与“野蛮排外”两个名词，把自己的民族运动与旧式农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区别开来。过去在评说这段历史时，往往过分强调“文明排外”的对外怯弱和害怕工农群众斗争的弱点，而忽略了它还有比笼统排外主义进步的一面。其关键就是革命派的“文明排外”已经与封建顽固势力彻底决裂，并且具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所回顾的那样：“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删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之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当时，在江浙地区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字和言论中，都是把广西会党起义队伍称作“民党”甚至“革命军”的，而他们也就自许为优胜于广西会党的“继此而起者”。即令是中国这样不成熟而又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当他们处于上升时期也还是具有赢得未来的信心的。

(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不失为一面光辉的、战斗的旗帜，而且是一面更加具有广泛影响的旗帜。自然，民族主义也只有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这面旗帜对于广

大人民群众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在 20 世纪初年，不仅“扶清灭洋”的口号早已为人们所扬弃，而且古老的“反清复明”口号也日渐缩小其影响，只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散发出巨大的政治魅力。新的民族意识与固有的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当人们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且自行抉择民族的前途的时候，他们的爱国精神便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翻阅癸卯这一年江浙地区的进步报刊，可以发现人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热爱自己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繁衍的地理环境。

新的民族觉醒首先表现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人们用尽各种各样美好的字眼来讴歌家乡的山山水水，因为家乡是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描述故土的山川形胜，不仅仅是为了唤起乡情，更是为了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之心，为了指明各省府州县以至乡镇对祖国应尽的责任。

浙江的爱国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

“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头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①

江苏的爱国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

“临长江，瞰天堑，流波汹涌，直趋东海，而环络江南十万迈当之面积者，此地势之足以称雄于大陆也。崇、淞天险，非江南之门户乎？狼、福横亘，非江南之咽喉乎？钟山龙踞帝阙凤翔，非江南文物之枢纽乎？震泽万顷，土地肥美；金阊十里，阡陌绵连，非江南财产之腹心乎？……而孰知欧美通商以来，沪滨

^① 《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第 1 期（1903 年 2 月）。

京口，首辟商埠，而金陵，而苏州，凡江南有地理关系之区，无不为泰东西诸国强权所攫制。……举目河山，苍凉落日，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①

小至绍兴一县，当年的爱国志士也是这样说的：

“诸君皆绍兴人也，试思绍兴者何人之绍兴乎？绍兴一切之事何人之责任乎？一家之中家用之备豫，子弟之良否，其为家人之责任无可疑也。即使家之人以事远游，其恐家用之不足而补助之，恐子弟之荒嬉而劝勉之，其责任终无可谢也。然则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顾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②

甚至连同里（属吴江县）那样的水乡小镇，人们也大声疾呼，提倡爱国尚武精神。“文明其思想而野蛮其体魄，此西国之所以强也。野蛮其思想而文弱其体魄，此中国之所以弱也。”^③他们希望在故乡做出榜样，对国家尽应有的义务。

这种热爱乡土的感情之所以可贵，在于它已经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整个国家的革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它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其实，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已经自我表白得很清楚：“江苏者，我全中国最受外力之包围攻击者也。……固先为外人之根据地以困我全中国之同胞者也。是故为江苏计，吾不得不改革江苏；为中国计，吾亦不得不改革江苏。”^④“吾浙江固祖国国系内之一分子，而治浙即所以治中国。……我诸父伯叔诸兄弟，生于斯长于斯，聚党族于斯，要皆有负责全浙之责任，而无可巧言饰词为中立计。”^⑤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爱乡作为爱国的起点，

① 侯生：《哀江南》，载《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② 《蔡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载《苏报》，1903年3月12日。

③ 金松岑：《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演说》，载《苏报》，1903年3月17日。

④ 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载《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⑤ 匪石：《浙风篇》，载《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

把治乡作为治国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充分唤醒各地有志之士革新建设本乡本土的自觉，是难以求得整个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乡又是爱国的实际内容，离开了爱乡，爱国便可能流于泛泛的空谈。所以江苏的先进人士又说：“今之人竞言爱国矣，而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以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至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吾欲于江苏及他省同乡会卜之。”^①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东京的浙江、江苏籍留学生，和其他各省留学生一样，先后在壬寅（1902 年）十月和癸卯正月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江苏同乡会，并且分别在癸卯正月和四月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浙江潮》和《江苏》。两个同乡会都设有调查部门，《江苏》辟有“调查录”专栏；《浙江潮》辟有“调查会稿”专栏，同时还辟有“新浙江与旧浙江”专栏，包括历史上之浙江、兵事上之浙江、教育上之浙江、物产经济上之浙江、浙江之地理、社会之一般风俗、交通机关、浙江之统治机关、农工商业上之浙江、外人于浙江之势力及其注意、浙江人之海外事业等方面。上述情况都说明，这些追求社会革新的有志之士，不仅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而且还做了不少实地的社会调查工作。特别是《浙江潮》的“调查会稿”上发表的有关各地社会情况的资料，其中有些比较具体的统计资料，至今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内进步知识界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影响也更为深入。中国教育会在江浙一些州县以至乡镇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如中国教育会会员在吴江设立同里教育支部研究会，蔡元培等在绍兴创立教育会，爱国学社社员殷次伊在常熟设立教育会支部，奉化也成立了教育研究会。此外，与此相类似的团体还有扬州师范学会、

^① 《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载《江苏》，第 1 期（1903 年 4 月）。

常州演说会、嘉兴演说会、无锡体育会等等。各地模仿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女学而建立的新式学校为数更多。杭州有大学堂退学生建立的励志学社和新民塾，嘉兴有进步人士建立的爱国女学社^①，常熟有殷次伊、丁初我等创办的塔后小学，吴江有金松岑、柳亚子等创办的同里自治学社（附设明华女校），上海华泾有刘季平创办的丽泽小学堂，此外还有吴中公学社、杭州公学社等等。爱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自行兴学，在家乡进行启蒙性的宣传教育，一时蔚成风气。

其中，常熟的殷次伊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甲午、乙未，游学燕蓟间，剌怵国耻，恸心刺骨，发奋力学，谋以救国。丁酉旋里门，与邑人士组织学社（即今公立小学校），首辟风气，为吾虞社会一线光明之起点。旋受学于海上东文社，继入南洋公学。……壬寅冬，退学事起，为全校学生代表，首鸣之于总理。事决裂，建议于张园，集退学生而吸合其团体，与之组织爱国学社。苦志筹画，不日成立，为今日吾国唯一完全之私校。学界主人翁之荣名，如次伊者殆无愧。校成，迫于家庭命，旋里修业……与邑中同志谋创立教学同盟会（今改教育支部），组织学界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会律井井，秩序巩固，俨然一国会之具体。次伊复极力运动之，不数月，建设城西小学校，为普及教育之起点。又谋改良公立小学校之规则，实施其国民教育。吾虞学界，新机怒发，同时有开智会、通学会、体育会之建设。一隙曙光，得照耀于虞山峰顶者，次伊影响学界之功，至大且伟也。”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狱起”，次伊愤郁于返里舟中投水自杀，时在癸卯闰五月九日之夕，死年仅 26 岁。殷次伊

^① 《江苏》第 5 期曾为嘉兴爱国女学社的成立发表《论中国女子之前途》一文，充满期望地说：“使二万万女子中果不乏矫矫者流挺然崛起，则此二十世纪之舞台中，何必不真有苏菲亚其人昌言革命，又何必不有罗兰其人为民族流血？畴昔依赖男子者，异日且协助男子拯救男子。”

的自杀，诚然并非必要的，但他以年轻的生命殉国，在社会上却引起积极的反响。特别是同乡的爱国志士，更为常熟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这样的好儿女而感到骄傲。他们奉献给殷次伊的不是哀伤的悼词，而是豪迈的颂歌。他们满怀深情为殷次伊立传：“美丽哉！吾虞方百里锦峰琴水明媚之山川。瑰伟哉！吾虞三千年南方文学秀灵之历史。学界风潮日波荡，自由钟声日震撼，一跃而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演四万万同胞悲壮义愤之活剧，生为人豪，死为国雄，以振起一乡之社会，感奋全国之社会者，有之，自殷次伊始。”他们以革命的誓言为死者放歌壮别：“铁血横飞荡九州，雄心不死贯全球。三千革命军声起，齐向长江日夜流。”^①正是像殷次伊这样的仁人志士，把江浙城乡各地的涓滴之水，聚拢合成革命的溪流。

应该说明一下，在东京留学生的一些活跃分子当中，很多人原来就是江浙地区学界风潮中的骨干，他们在国内已经受过斗争的磨炼，到日本后仍然与故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浙江潮》的主编人孙翼中（字耦耕，号江东）是杭州求是书院《罪辩文》案的主角，蒋方震也是这个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江苏》的主事者和主要撰稿人黄宗仰是中国教育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柳亚子则是以教育会会员资格加入爱国学社的附读生。此外，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江苏同乡会、浙江同乡会中的一些骨干，原先也是国内学界风潮中涌现出的活跃分子。孙翼中曾受浙江同乡会的委托，发表《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要求浙江向湘、鄂两省学习，多派有志青年出国留学，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潮。黄宗仰、柳亚子到东京后，更撰写大量诗文，鼓吹排满革命，并且歌颂与宣传羈押在西牢中的章太炎、邹容的斗争事迹。而东京这些宣传工作，又经常是在章、邹等国内爱国志士的关注和鼓励下进行的。如癸卯九

^① 初我：《常熟殷次伊传》，载《江苏》，第4期（1903年6月）。